

海外视野

“协议”边缘的哈佛：一所大学与一个时代的抉择

■郭英剑

近一个月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所创办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多次高调宣称，哈佛大学“非常想达成协议”。这所全球顶尖学府是否将在政治高压下妥协的话题，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争议。随着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冻结研究资金、提高捐赠基金税率、指控校方违反《民权法案》等一系列手段接连施压，哈佛管理层已悄然开启与政府的谈判。而与此同时，校内学生群体强烈呼吁“抵抗到底”，公开声反对任何损害学术自由与制度独立的妥协。

在高等教育面临政治重塑的关键时刻，哈佛究竟应坚守原则，还是作出让步？这一抉择不仅关乎一所大学的命运，更折射出整个美国高教体系的深层困局。

特朗普宣称即将与哈佛达成协议

6月20日，特朗普高调宣布，美国白宫与哈佛大学之间正在进行谈判，且即将达成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性协议”。此言论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界和哈佛校内引起强烈反响。特朗普并未透露具体协议内容，但他的言外之意是，这项协议将在政治与教育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对此，《纽约时报》以及哈佛大学的官方校报《哈佛深红》等媒体迅速跟进报道，证实双方确实正在就相关事宜进行磋商，但强调谈判尚未最终敲定，协议也未正式达成。

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特朗普试图将谈判结果描述为他为高等教育“施压成功”的成果，但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哈佛方面依然试图在坚持学术自由与制度独立的前提下进行对话。而在哈佛校内，对此表态担忧的氛围日渐浓厚。

7月4日，特朗普对外表示，白宫与哈佛大学之间的和解谈判仍在进行中，并称“他们（哈佛）非常想达成协议”，这一表态距离他首次公开谈判消息已过去两周。尽管特朗普言辞乐观，但具体协议内容与签署时间仍未明朗。

就在几天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正式认定哈佛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未能有效保护犹太人与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该认定可能引发司法部提起诉讼，但往往成为推动和解协议的前奏。特朗普在讲话中暗示谈判仍“有可能达成”，但表示“不着急”，并提及谈判涉及“大笔资金”。

目前，美国联邦机构已冻结约30亿美元对哈佛的资助，并暂时取消其未来申请拨款的资格。哈佛方面尚未对特朗普最新表态作出公开回应，但据哈佛校报报道，该校校长加伯在一场捐赠人电话会议中承认正在与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强调哈佛仅就其已有的应对举措与政府对话，如反对反犹主义和增强观点多样性。但在更为私密场合，加伯似乎表现得更为强硬。有消息人士透露他曾表态：哈佛不会接受任何损害其管理权的协议。然而，这一立场的实际“底线”尚未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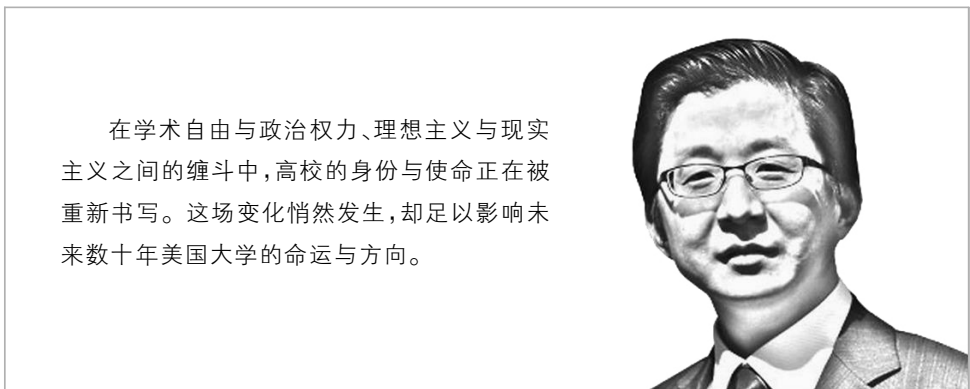
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压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7月4日恰逢美国独立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包含税收与支出内容的综合性法案“大而美”法案，其中有

2025 年 7 月 8 日 星期二

主编 / 计红梅 编辑 / 孟凌霄 校对 / 何工劳、唐晓华 Tel: (010)62580616 E-mail:lxmeng@stimes.cn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在学术自由与政治权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缠斗中，高校的身份与使命正在被重新书写。这场变化悄然发生，却足以影响未来数十年美国大学的命运与方向。

一项规定将导致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收入税率从1.4%大幅上调至8%。根据该法案，凡每名本土缴费学生对应捐赠资产超过200万美元的私立大学，将被征收8%的顶格税率。哈佛人均捐赠超过290万美元，年投资收入达25亿美元，显然位列该税级。鉴于其捐赠基金构成中仅20%可灵活运用，新税收将主要影响财政援助、教师薪酬与科研等核心支出。这一变化是美国联邦政府对精英高校财政结构最严厉的一次干预，预计将令哈佛每年增加超过2亿美元的税负。

哈佛尚未正式回应将如何应对，但媒体已经指出，这将导致哈佛不得不采取裁员、削减项目、重新调配无约束基金等措施。本次新税制即刻生效，涵盖自7月1日开始的2025财政年度。

长期以来，特朗普与共和党人一直指责哈佛等名校坐拥庞大免税资产，却未履行足够社会责任。哈佛对此持续游说，试图阻止捐赠税的扩大化，但未能扭转形势。

这项税改无疑是哈佛在面临冻结科研拨款、招生政策审查等一系列政治压力之后，所遭遇的又一次重大打击。正如加伯在2024年所言，高额捐赠税“是让他彻夜难眠的威胁”。如今，这一威胁已成现实。

哈佛 200 多名学生发公开信

7月4日，哈佛校内有学生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哈佛大学“拒绝任何不合理或非法的要求”。

这封公开信由“哈佛自由学生”组织发起，是一封面向哈佛大学的呼吁信，目前有200多名哈佛本科生与研究生成名。信中反对哈佛在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中作出妥协，强调“如果哈佛被特朗普政府统治，它就不再是哈佛”。

该组织是在今年春季成立的一个尚未获得官方承认的学生团体。信中写到，如果真如特朗普所称，哈佛即将与白宫达成“历史性协议”，那么他们希望这不是因为哈佛屈服，而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让步。尽管哈佛校方尚未透露协议的细节，仅称其持续向政府汇报已采取反对反犹主义和促进观点多元的措施，但学生、校友与教师普遍担忧哈佛可能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公开信明确反对大学在谈判中出让学术自由、机构独立性和学生的言论自由，强调不能以安抚政府为代价牺牲课程内容、解雇教授、惩罚学生的和平表达，尤其反对“交出国际学生的纪律记录”，称这可能导致其因“意识形态驱逐出

境”，一旦发生，将为全美高校树立危险先例。

该组织发言人施瓦茨表示，学生签名旨在表达与校方的团结，希望鼓舞哈佛继续坚持立场。选择在独立日发布信件，正是出于对“美国自由传统”的象征性致敬。他强调，这场行动并非政治极端，而是希望凝聚大多数学生的力量，共同捍卫哈佛的核心价值。

糟糕的协议不会保护哈佛

事实上，在7月2日的哈佛校报上已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为《加伯校长，与特朗普达成的一项糟糕协议无法保护我们》。该文章作者是3位哈佛的本科生。

该文借特朗普宣布与哈佛大学即将达成“令人震惊的历史性协议”为背景，强烈呼吁哈佛大学在与联邦政府的谈判中坚持立场，不做任何出卖学术自由与学生权利的妥协。

文章称，该文代表了受特朗普政府政策冲击最大的学生群体：国际学生、受科研经费削减影响的研究生、担忧反犹主义的犹太学生，以及参与亲巴勒斯坦抗议的学生。他们指出，这些群体都已深陷特朗普对哈佛的攻击漩涡，若哈佛妥协，将带来巨大的伤害——有人可能被驱逐、逮捕，学术梦想将被摧毁。

文章警告称，特朗普惯用的谈判策略是“得寸进尺”：一旦哈佛在某项要求上让步，白宫将提出更多无理要求。例如，提供更多学生名单、干涉课程设置与教职聘用，甚至清洗对其关税政策或联邦权力提出批评的经济学与法学教授。作者担忧哈佛若像哥伦比亚大学一样让步，将带来更广泛的连锁反应。

作者坚称：“没有国际学生的哈佛，不是真正的哈佛；若失去学术自由，哈佛便不再是大学。”文章强调，不能允许联邦政府决定学生上什么课、谁被录取、哪些教授可以留下。与白宫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能成为侵犯学生言论权利与个体尊严的工具。

该文强调，当前许多大学正在与哈佛形成联盟，共同抗争。作为拥有巨额捐赠基金的学校，哈佛若低头，其他财力不济的高校更无力抗争，或将接受更糟的条件。因此，哈佛必须挺住，否则将给整个学界留下“投降就能平安”的危险信号。

文章最后指出，在特朗普企图用“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的逻辑分化哈佛内部时，反而促使校园更加团结。该文引用加伯所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独立性”，呼吁加伯继续抗争，并明确表示：一个以出卖学生权利与大学价值换取短期安全的协议，不会令他们感到被保护，只

会助长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的打压。

这篇评论文章直言不讳，表明了部分哈佛学生在当前政治压力下坚定捍卫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立场。他们不仅有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更具有团结各方、弘扬正义的勇气。文章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将大学的抗争从“机构自保”提升到“公共责任”的高度，呼吁整个社会警惕并反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不当干预。这是知识共同体在危机时刻应有的清醒与担当。

从哈佛出发，高等教育将去向何方？

在与特朗普政府的博弈中，哈佛大学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一场事关制度独立性、学术自由乃至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走向的关键抉择。

随着谈判持续推进，特朗普数度公开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并声称“哈佛非常想和解”。这释放出清晰信号：在哈佛的高层管理者内部，确已显现出某种务实妥协的倾向。否则，以特朗普的风格与敏感度，不可能反复高调释放乐观预期。

与此同时，哈佛校园内部也不乏抵制与政府谈判的声音。这种声音固然充满理想主义，但也体现出大学中一部分学生对于言论自由、多元价值和制度独立的高度认同。然而，从政治现实与财政压力双重角度看，他们的力量虽不可忽视，却难以决定最终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内部还存在着一个沉默却关键的群体——那些既不高调反对，也不公开支持的教师、研究人员和普通学生。在我看来，他们更关注现实层面的考量：科研经费被冻结、招生资格受限、赋税飙升……这些政策直接威胁他们的工作、学术发展与学习环境。他们或许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价值观，也可能对哈佛过度左倾持保留态度，但他们倾向于相信管理层比激进的学生组织更能权衡利弊、妥善应对政治高压。在当前形势下，这部分“温和沉默者”很可能成为哈佛最终决策的隐性支持力量。

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的持续施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重塑美国高等教育格局的战略一环。从冻结约30亿美元科研拨款到提高捐赠基金税率，再到引用《民权法案》第六章对哈佛展开调查，特朗普企图通过政策与舆论双重手段，迫使“象牙塔”回归保守立场，调整其长期被视为“自由主义堡垒”的意识形态走向。哈佛若最终签署协议，不仅意味着其自身治理结构与价值立场的调整，更可能在制度与象征层面引发一场全美高教体系的“右转”连锁反应。

可以预测，哈佛与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因为在连续数月的政治风暴中，哈佛已经体会到“孤军奋战”的代价；而在社会舆论场中，对高校政治偏向、校园抗议失控、学术精英脱离现实的批评也愈演愈烈。哈佛若选择与政府妥协，看似是一次退让，实则是一种制度适应，是在当前政治格局下对自身生存策略的重新定义。

因此，可以断言：如果哈佛与特朗普政府最终达成协议，将不仅是一次校政和解，更可能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结构性转向的分水岭。在学术自由与政治权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缠斗中，高校的身份与使命正在被重新书写。这场变化悄然发生，却足以影响未来数十年美国大学的命运与方向。

“拔尖计划”动态进出机制应走出“重选拔、轻培养”泥沼

■刘涪祎

为加快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于2009年启动。

目前，高校普遍设置了“动态进出”机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学生激励和滚动手段。所谓“动态进出”，是指根据学术志趣、学业表现、科研能力等因素，对学生进行动态进入和分流退出的管理机制。

然而，笔者在2020年到202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10所“拔尖计划”高校学情进行追踪研究时却发现，“动态进出”机制普遍存在方案简单粗暴、操作流于表面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两种“动态进出”机制

目前，“拔尖计划”高校主要实施两种“动态进出”机制，一种是群体内按比例淘汰，一种是划定绩点红线淘汰。两种方式看似是精准筛选的滤网，实则隐患重重。虽然能筛选出部分不适宜继续留在培养特区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拔尖群体水准，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向更具潜力的学生倾斜，但机械的淘汰规则如同冰冷的工业流水线，以固定比例切割、用单一绩点标尺丈量，将复杂的人才成长过程简化为非黑即白的终结判定。

群体内按比例淘汰是最常见的机制，一般规定大一和大二每学期绩点排名在后30%的学生将失去拔尖班资格。“末位淘汰”不取决于个体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学生明确知道达到何种排名才能避免被淘汰。尽管这种方式便于操作，却暗藏很大弊端，它将学生置于激烈的内部竞争之

中，学生们不再是携手共进的伙伴，而是“你死我活”的对手。

为了不被淘汰，学生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同伴竞争中，甚至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如互相隐瞒学习想法、在小组作业中推诿责任等。同时，这种方式忽略了每个学生的独特成长节奏和潜力。有些学生可能起步较慢，但后劲十足，却因为前期成绩不佳，早早被淘汰，失去了“特区培养”机会。此外，按比例淘汰带来的巨大压力，还可能导致学生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焦虑、抑郁等情绪在学生群体中蔓延，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

划定绩点红线的机制同样存在不小的问题。这种方式以绝对学业标准作为流动门槛，不受群体表现影响，如满分为5，红线为3.2。尽管这样做将关注点从相互比较转向绝对能力，标准客观透明，评价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但实际上却窄化了“进出标准”。

绩点的计算往往主要依据考试成绩，而考试成绩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学术兴趣、科研潜力和综合素质。有些学生可能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对所学方向的专业课程尤为擅长，但在其他课程上存在明显短板；有些课程的考试难度较大，学生即便付出了巨大努力，也难以达到高绩点要求；而且，绩点红线淘汰过于注重结果，学生为了达到绩点要求，往往只是机械地记忆知识点，应付考试，而缺乏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不利于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走向动态化支持

以上两种盛行的“动态进出”机制不仅忽

视了学生成长的差异性可能性，更暴露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长期深陷“重选拔、轻培养”的思维泥沼。二者过于关注教育的筛选功能，希望通过淘汰机制选拔出“好苗子”，却忽略了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发展人。这种“重选拔、轻培养”的理念是教育功利主义的表现，不仅损害了拔尖学生的成长权利，也阻碍了拔尖创新人才选育的长远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绩点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应运而生，成为破局的关键。它真正体现了“重培养”理念，不再仅仅依靠冰冷的分数或固定的比例，而是经过主客观综合考量之后慎重决策，将培养置于选拔之上。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采取此种方式的拔尖基地，规定在本科学习的前3个学期期末，由不同学科方向的项目主任分别牵头组成5-7人的专家组，逐一与各个方向绩点后50%的拔尖生面谈。每一名被面谈学生将接受严肃、认真的综合鉴定，最终的淘汰人数维持在个位数。

精心设计的面谈环节能够进一步了解学生成绩之外的额外信息和表现，帮助判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绩点落后。此外，专家组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优势和潜力，发现在传统评价方式下易被忽视的“闪光点”。

笔者认为，绩点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之于专家组团队间接提供了学业反馈与帮扶。以致远学院为例，每学期的实际淘汰人数极为有限，最终各个学科方向将有1-2名学生失去拔尖资格。这也就意味着，这种评价方式的本质不是残酷筛选，而是师生交流。通过面谈交流，5-7名学科专家组

成了“成长护航团”，不仅能够敏锐捕捉后进生 在知识理解、学习方法、时间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解答个性化困惑，还可以为其联络并搭建“专家指导+朋辈互助”的帮扶网络。

这种“发现问题—精准干预—跟踪反馈”的闭环机制，使得后50%的学生不再陷入无助和焦虑，而是在专业支持中重拾信心，真正将教育评价转化为推动成长的动力，凸显“以学生为本”的核心价值。每名拔尖生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潜力，绩点与专家评价相结合做到了尊重和负责。

诚然，高资源投入的绩点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会招致一些质疑，如专家组面谈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且评价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的素质和经验，主观偏见可能影响公正性。但笔者认为，拔尖群体个性鲜明、差异突出，打破常规的资源投入是应有之义，而且现有的拔尖生规模维持在小范围，高投入、精细化的“动态进出”方案是可以多数高校实现的。

鉴于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动态进出”机制的破局不再是终结性选拔，而是动态化支持。一方面，为进入培养特区的学生提供持续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对于走出培养特区的学生，帮助他们实现更好发展。

（作者系江苏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育研究》副主编，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国本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学习行为及其与环境互动机制研究”〈CIA220284〉阶段性成果）



全球范围内的“私立大学关闭潮”正在引发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反思。近年来，美国数十所小型文理学院因财政压力和招生人数锐减而宣布关停或并校，日本地方私立大学面临“少子化”导致的长期生源危机，韩国教育部也多次发布私立高校退场指引、推动资源整合。这种现象并非个案或短期波动，而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承受力有限、社会需求转型等多重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凸显了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中无法回避的结构性挑战。中国民办高校也逐渐从过去20年的大规模扩张进入了一个招生竞争白热化、生源压力加剧、办学模式转型的拐点期。

回顾过去20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乘着教育普及化和人口红利的东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2015年全国民办本专科在校生610.9万，到2024年已超过1052万人，增幅超过70%，在校生规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民办高校为“上大学”提供了更多机会，成为高等教育扩张的重要支撑力量。

这一轮高速增长不仅满足了社会多样化受教育需求，也为不少中小城市和新兴产业集聚区提供了人才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扩张模式高度依赖人口基数和学费收入支撑，缺少稳定的公共投入和充足的内涵建设，隐患也在规模繁荣的表象之下悄然积累。2021年，全国曾有9所民办高校停止办学；2023年多地出现招生危机的讨论，生源争夺战日趋激烈。近两年高考招生工作结束后，多地民办本科院校出现了较大规模招生缺额，即使经历多轮大幅降分补录，依然难以填满计划名额。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未来10年内高中毕业生总数难以避免地减少，这是所有高校都必须面对的结构性挑战。民办高校没有财政拨款兜底，对学费收入的高度依赖使得它们在生源总量萎缩时首当其冲暴露出财务风险。

民办高校的招生困难更是教育需求结构和竞争格局改变的结果。家长和学生不再高的期望也在发生变化。学历不再是就业竞争力的唯一保障，就业市场对文凭含金量、学校声誉、专业设置、就业渠道等愈加敏感，公办本科、职业本科、高水平高职在招生竞争中往往具备更高的吸引力。很多民办本科院校长期存在办学同质化严重、专业设置跟风、产教融合水平不高的问题，部分民办高校的一些短视办学行为从长远看损害了民办高教整体的社会信任。

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也在经历人口转型和市场竞争的洗礼。美国小型私立文理学院的关闭潮与其高度依赖学费收入、奖学金竞争加剧、捐赠资金有限和入学人数下降密切相关。日本早在20年前就遭遇“少子化”导致的高教危机，大量地方私立大学面临入学人数不足甚至“零报考”的极端情况，日本政府不得不出台退场引导和私学振兴基金等政策，鼓励弱势院校有序退出或合并。韩国同样已多次发布针对低招生率私立高校的治理指引，强调通过退出机制提高整体质量。在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竞争，建立更加理性、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

当前，中国民办高校招生寒潮所揭示的风险非常现实和直接。首先是财务安全风险，高度依赖学费收入的学校在招生不足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其次，为了“抢人”而无序降分录取导致毕业生质量下滑、投诉增多、社会认可度降低，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需要进行一场冷静且系统的反思。民办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里为缓解高考升学压力、推动高教普及化作出巨大贡献，但不能寄望于继续依赖无限扩张和人口红利。

构建系统性的应对机制已迫在眉睫。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完善分类管理和有序退出机制，避免“僵尸学校”长期拖累体系声誉。其次，应当鼓励优质民办高校转型为真正的应用型大学，加强产教融合、专业特色建设、就业渠道开拓，形成稳定的人才供给机制和提升市场认可度。再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金融资本也需要探索更加多元、可持续的合作和支持模式，减少对单一学费收入的过度依赖。最后，各地高教布局和招生计划应当依托中长期人口预测，避免盲目新增高校和同质化竞争。

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扩张型增长的时代正在落幕。接下来的关键命题是，能否在这场阵痛中完成结构调整和内涵提升，能否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不仅关乎几所民办高校的存亡兴衰，更关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未来方向。唯有在冷静的市场机制、规范的退出体系、有效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多元合作中，民办高校才能找到新的生存之道，也才能继续为国家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应有的力量。

全球私立高校关闭潮给民办高教带来的启示